

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纳日碧力戈

(内蒙古师范大学 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 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关键在于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在于从民族共有、文化互联、命运相同中发现提炼和铸造重叠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和凝聚力建设。共同体意识不能靠少数民族单向铸牢,而是要靠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双向铸牢,不仅少数民族要认同多数民族,多数民族更要认同少数民族,共同认同新时代中华民族,彼此差异互补、互联互融、求同存异,形成富有活力、持续创新从而可持续发展的民族生态。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双向认同;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9)04-0001-05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少数民族维度

近代以来,自从法式国民-民族国家观传入中国,“一族一国”成为诸族精英们追求的现代国家模式,经过一系列“战争与和平”的大事件,人类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流淌鲜血和泪水,书写凄婉和伤痕,讴歌壮烈和不朽,尘埃落定,终于碰撞出现代国家格局。抚今追昔,“一族一国”是梦想,“一国多族”是现实;一些民族以主流身份建国,另一些民族以少数群体身份加入,大局已定,格局分明。

在“一国多族”的现代政体模式中,少数民族问题显得格外突出,由于他们拥有不同于主流民族的语言或文化,让主流社会的书斋精英们颇有些手足无措。在他们看来,语言文化隔,民心相通难;民心不通,共同意识何来?这样一来,铸牢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重中之重。

需要指出的是,少数民族对于祖国的历史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条件。秦汉在新疆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在西北羌地设置护羌校尉,在东北乌桓地区设置护乌桓校尉,在相当于今天的桂、滇、黔、琼等地设置郡县,统一了边疆地区。与此同时,匈奴统一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建立了号称“引弓之国”的强大政权。时至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迁徙带来大融合,大量少数民族

进入中原,大量汉族南迁长江、珠江流域,或北迁关外。唐初呈现出“胡越一家”的盛况,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民富国强,增强了周边民族的向心力和内聚力。宋朝先后与契丹辽朝、女真金朝对峙,但交往交流密切,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吸收了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元朝扩展疆域,建立统一帝国,创设“行省”制度,首次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为近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强大基础。清朝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至我国南部、东部的整个地区都统一在中国版图之内。历史上的百越族和西部少数民族首先栽培稻和麦,少数民族也较早栽培棉花、甘蔗、茶树等,汉唐畜牧业因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良种、良法和饲料而兴盛起来,唐宋时期的乌蛮和白蛮擅长水利建设,清代朝鲜族移民把水稻种植技术带入东北地区,鲜卑人最早发明了马镫,诸如此类的发明创造还有骆越族的铜鼓、西南夷的采矿技术和金玉器具、匈奴人的兵器、乌桓族的刺绣和毛毯、壮族和侗族的壮锦和侗锦、白族的“大理刀”、黎族的纺织技术等等。中国各民族的先人在衣食住行、音乐舞蹈、雕塑建筑、语言文学、科学技术等方面,对中华历史文化作出了全面贡献^[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央政府统一领

收稿日期:2019-04-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17ZDA15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0AMZ003)。

作者简介:纳日碧力戈,男(蒙古族),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族群理论、象征符号。

导下,确认了56个民族,成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民族识别”充分考虑到各民族地方的历史传统和具体特点,也充分考虑到各族代表人物的诉求、感情和长远利益。56个民族的确立并非“心血来潮”,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精英政治协商、感情沟通的结果,来之不易,弃之不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84年5月31日修订通过,自1984年10月1日起施行。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一项基本法律,起到确保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作用,对发挥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国家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对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促进民族自治地方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立和实施,大大激发了少数民族爱国和建国的热情,他们在来自内地的各类支边人员的帮助下,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学习汉语、汉文化,学习中央文件,领会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付诸实践,融入生活。对于各个少数民族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心怀感恩之情,不断加强和加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使在最困难的年代也保持了忠诚之心。

回首历史,总结经验,中国民族工作的成功与失败,除了路线是否正确,还取决于方法是否得当。方法决定成败,对象、目标、任务、环境、态度、识见、思路决定和影响方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民心相通是最大的政治,民族团结是最重要的任务,民情、国情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以情动人、真诚相待是最好态度,智识和知识构成不可或缺或识见,综合考虑、因地制宜、平衡治理是致中和的思路^{[2]1-28}。这些都是对多年以来中国民族工作的最好总结。

不过,单靠少数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多数民族的积极参与,而且这种参与一定以充分吸收上述中国民族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参与,是符合建设和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造性参与,而不是旧有的“非我族类”的封闭式参与。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事关重大,影响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向,决定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要靠多数民族

新时代中华民族不同于旧时代中华民族。新时代中华民族讲包容,讲平等,讲团结,讲公平。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这是对中华文化的新时代定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真正确定了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根基。各民族认同本民族文化,共同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而不相悖”^{[2]61}。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2]144}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少数民族认同多数民族、少数民族彼此认同,更需要多数民族认同少数民族,把少数民族文化真正作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加以认同,加以热爱,加以尊重,这样就更加容易赢得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文化的认同、热爱、尊重,为中华文化的整体认同夯实基础,塑造灵魂。邓小平曾讲过:“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3]

多数民族把少数民族文化看作是整个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打开民族团结之门的一把金钥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在“交”上,交相、交互是根本,是关键。人类学家萨林斯在定义亲属制时使用了“交互”或者“相互”的概念^①,至少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启发性的。

多数民族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是全国通用语言,他们的文化是全国性文化,他们的话语具有导向性,他们的实践具有普遍性。多数民族对于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如果多数民族把少数民族文化排除在中华文化之外,那就不是少数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的问题了,更不是“并育而不悖”,而是“非我族类”的问题了,这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

三、各民族互相认同才能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既然“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中华

① Mutuality of Being,“存在的相互性”或者“生存交互性”。参见司马少林(马歇尔·萨林斯):《亲属关系是什么,不是什么》,陈波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民族是各民族的统称,那么,各民族彼此认同,各民族文化彼此交融,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前提。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的命运交互性和生存交互性,为这种认同和交融提供了必要的论据。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交互性虽然不能成为确保现代共同体形成的必然逻辑,但它总是指向一种高概率的归宿,即形成当下这个命运共同体和认同共同体。

回溯中国历史,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自古互为条件、互为环境,人口和文化交互融入,彼此充实,互相壮大。从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到元代汉人取蒙古名,从“哥哥”、“胡同”进入汉语到汉回、藏回、蒙回等的多彩共生,中国各民族已经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互联共同体,正在成为凝心聚力的认同共同体。

蒙古入主中原,按照萧遥天的说法,“宋史末叶及元史番名满纸”^[4]。元代汉人多作蒙古名,如江西汉人刘哈喇布哈,冀州汉人贾塔尔琿、平昌汉人张巴图、宁夏汉人杨朵尔济和迈里古思、宏州汉人拜帖木儿等等^[5]。查《广西岑氏族谱》^①,元代人名有八世长子帖木儿、次子阿刺兰、三子怒木罕、四仔阿刺辛、五子不花也先,九世帖木儿之子野先,十世野先之子伯颜。

北方话的东北次方言^②,分布在今东北三省绝大部分地区、内蒙古东部以及北京市区,共同的语音特征是声调分高平、高升、曲降、全降四种,有轻声,儿化词偏多,该次方言区与其他次方言的界限,恰好“与清朝从东北进关的‘御道’和关外的柳条边重合”,说明这个次方言区的形成涉及“辽金时女真人掠夺关内汉人,明清时山东、河北人闯关东,清朝三百年间满族经常出人行走关内外”,“通过次方言的划分可以看出辽金、明清移民的起点与终点及清朝满族的活动范围”^{[6]258}。满汉交往、交融在语言中留下印迹。

今天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普通话是建立在北京话的基底上的,而北京话又是以北京京腔儿为基础的清代 mandarin(官话)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京腔儿为主要特征的北京话实际上是清初从东北入关的八旗兵民的满式汉语与明末北京汉人(含南京迁北京的说下江官话的人和金元时期女真所留后裔,元代所称的汉人)汉语在乾隆末年北京内外城解体后相互融合的语言结晶。这种老北京话虽然作为汉语发展至今,但其中所借用的满语词、满汉合成词、满汉并列词(或者叫做通

过满式汉语保留下来的满语词)仍然不少^{[6]200}。

北京话中的满语词^{[6]200-201}(节录)

汉字写法	清代满文音 (罗马字转写)	现代北京音 (汉语拼音)	汉义
秃噜	turu	tulu ^③	脱掉
肋臑 ^④	letelata	lete	累赘、不利落
姐姐	Nionio	Niou	爱小儿词、女孩儿
得瑟(嘚瑟)	deso	dese	叫喊、张扬、极显摆
啰嗦	lorsem	loso	话不歇状
邋遢	lata	late	迟钝、懒散
搭档	tatan	dadang	窝棚、伙伴
撒目	sabu(mbi)	samu	看见、扫视
马勺	maša	mashao	带木柄的勺子
拉忽	lahu	lahu	干活粗糙
挺	ten	ting	极、很

北京话中的满汉合成词^{[6]201-202}(节选)

(括号里的字为汉语词或词素)

汉字写法	清代满文音 (罗马字转写)	现代北京音 (汉语拼音)	汉义
巴(不)得	bade	babude	极想捞着
恨(不)得	hendu(mbi)	henbude	极想让
轧(马路)	yabu	yamalu	在马路上行走散步
(车)把式	bakši	chebashi	赶车的老板
马虎(眼)	mahu	mahuyan	鬼脸、假面具、使眼色打掩护
(瞎)掰	baica	xiabai	瞎 验 查、瞎说
(配)搭(儿)	da	peidar	给长官做配角的人
胳肢(窝)	geji(hešembi)	gazhiwo	腋窝

北京话中的满汉并列互注词^{[6]202}(节录)

①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② 林焘称此方言区为“北京官话区”。参见林焘:《北京官话区的划分》,《方言》1987年第3期。

③ 原文作“turu”,疑为“tulu”之误。

④ 原文作“臑”,疑为“臑”之误。

(括号里的字是汉语词或词素)

汉字写法	清代满文音 (罗马字转写)	现代北京音 (汉语拼音)	汉义
(庄)屯	tokso	zhuangtun	村庄
档(案)	dangse	dang	个人或单位的 履历文件
(哨)卡	kalun	shaoka	边界哨所
(公子)哥儿	age	gongziger	贵族家的 少爷
猫(腻)	moo	maoni	隐藏
(末)了	lala	meliao	最后面

其实,语言上反映出来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可以追溯到更早。例如在中古时代,鲜卑语“阿干”进入汉语,变成现代汉语“哥哥”^[7]。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首次提出这一点,认为“从唐代起在口语中代替了‘兄’的‘哥’可能是外来语”^[8]。汉语史研究者同意,汉语的“哥哥”来自“阿哥”,而“阿哥”又来自鲜卑语“阿干”^①。

生活在西藏的穆斯林称为卡契、“藏回”,他们的祖先来自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拉达克,也来自我国的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省份,他们在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同时,在语言、服饰、饮食、婚姻等方面,已经完全融入藏族^[9]。明代伊斯兰教在蒙古人中盛行,皇亲贵族有不少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蒙古穆斯林有的定居下来,加入了当地的回族,有的继续从事畜牧业,但坚守伊斯兰信仰,这些穆斯林牧民被称为“托茂”、“托茂家”、“托茂人”^[10]。历史上把汉化的“回回人”或者“回回”化的汉人称为“汉回”,他们构成兼有汉人文化和伊斯兰教信仰的群体。清代汉人称“伊尔根”(伊勒根)(irgen),意“民人”,因此,清代的“汉回”被称为“民回”,到清末民初,“汉回”之称恢复^[11]。

如果说“旧时代”中华民族对少数民族“模糊处理”的话,那么,新时代中华民族则指明各民族共同归属中华民族,不再有“模糊处理”的余地。旧时的“华夷之辨”、“非我族类”,都已经成为过去,不再成为划分人群的根据。新时代中华民族以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认同为基础,以命运共同体和共有精神家园为图景和愿景,为中国各民族凝聚而成的共同体提供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实践空间。

经历过碰撞、冲突、协商、团结对外、和睦共生的互动过程,中国各民族根据历史给出的答案,彼此认同,交互凝聚,共同组成新时代中华民族。这是层层递进逻辑表述:我们出生在各自有特定语言文化背景的家庭,父母生身,文化滋养,“乡音不改鬓毛衰”;成丁后游

走他乡,方言混杂,文化多元,需要学习国家通用语,学习主流文化;出国深造,交流访学,护照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国”,无论你的母语是什么,你的乡音是什么,你都是中国人。根据巴特(巴斯)的边界理论,在县城里面,别人问:“你是哪里人?”回答应该是“我是潞城乡人、白川乡人”等等;在省区里面,别人问:“你是哪里人?”回答应该是“我是齐齐哈尔人、昆明人”等等;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别人问:“你是哪里人?”回答应该是“我是内蒙人、山西人”等等;在国外,别人问:“你是哪里人?”回答应该是“我是中国人”。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成员来说,当少数民族和当中国人是并行不悖的,属于层层递进的关系,在身份上是互补的:少数民族身份是“因生赋予”,至少生身父母无可选择;中国籍是现代国家带有强制性的赋予,在极端的情况下还可以被剥夺,公民有义务认同自己的国家。国家认同需要由文化认同支撑,尽管国家认同属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还是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接受政治认同的“格式化处理”。国家会采用各种手段,如海关监理、新闻检查、舆论监督、政治审查、国家标准等等,尽量让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一致起来,让国家边界和文化边界重合。

四、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之路

当代中国各民族都是混合而成的人群,各族人民自古有交往、交流、交融的传统,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也是如此。例如历史上的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充分吸收汉族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借鉴中原文化元素,融入自己的制度设计和疆土治理之中,为元朝统一准备了前期条件;中原王朝也借鉴和保留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朝政经验,尤其是五族共和与五十六个民族的确认,都有其历史背景和传统考量。

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文化缺一不可,而且还要具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个条件,因此苏联学者叶菲莫夫认为汉族属于部族,不属于民族^[12]。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没有按照苏联模式把人们共同体分成民族、部族、部落,而是让各民族一律平等,都获得“当民族”的资格,即便是那些在共和国成立之初还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群,也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正式

① 参见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5 页;胡双宝:《说“哥”》,《语言学论丛》第六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赵文工:《“哥哥”一词来源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

成员,地位平等,团结互助,共同进步。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是探索、创新、成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 1931 年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纲》等文献,规定少数民族可以建立自治区,在抗战时期主张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毛泽东在 1938 年 10 月提出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都拥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有权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与汉族共同建立统一国家^[13]。

根据毛泽东、李维汉等共产党人的观点,按照中国方式解决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据在于:中国是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鸦片战争后变成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少数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都对祖国的历史作过贡献;中国各民族人民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赞成平等联合,不赞成互相压迫;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小,过去只占总人口的 6%,这不同于苏联非俄罗斯民族人口占 47% 的情况。苏联采取联邦制是形势所迫,本应该实行单一制国家形式下的地方自治和民族地方自治^[14]。此外,中国历史是多族“同治”的历史,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都统一过中国,各自都培养了相对于中国本土的主体性,培养出与乡土意识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家园意识和祖国意识。近代历史上的中外战争把各民族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国际民族事务的经验也表明,“民族自治”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最终归宿,只有这样,不同的文化人群能够在保持本群体认同和特殊性的同时,“平等地参与生产、分配和管理的实质性过程”^[15]。随着经济

发展和教育提高,个体和群体的自我意识也会提高,民族事务会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民主与法制变得极其重要,只有总结历史,立足现状,放眼未来,才能够走出符合国情的民族事务治理之路。

五、求同存异的生态之路

保持各民族之间的人文生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关键在于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在于从民族共有、文化互联、命运相同中发现提炼和铸造重叠共识。理念和希望很重要,如同“心想事成”,只要怀有团结之心、包容之心和热爱之心,就能找到民族之间的重叠共识,彼此就能找到积极有利的因素。

当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甚嚣尘上,新纳粹主义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有抬头。但是,人类不能放弃和平,不能放弃公平正义的理念。恩斯特·布洛赫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具体的乌托邦”(konkrete Utopie),强调根据物质开放的可能性,不放弃对于“尚未”的期盼,拥抱敞开的希望,胸怀具体的乌托邦^[16]。这种决不放弃希望的信念和勇气值得推崇。道家思想中有“三生无限”的开放性,有助于我们修正二元对立的敌对观,回归致中和的三元观,以开放的胸怀,以乐观的心态,化解仇恨,求同存异,重叠共识。

万物生长,万象共生,这是一幅壮美的生态景观。驻足远眺这样一幅壮美的愿景,中国各民族要做到“有族而能超越”,做到民族兼爱,爱我族,也爱他族,凝聚诸族为一体,形成更高的认同,铸牢共同体意识。多数民族认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认同多数民族,共同认同中华民族,形成富有活力、持续创新从而可持续的民族生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走生态之路,即差异互补、互联互通、求同存异的共生之路。

参考文献:

- [1]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修订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修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2-19.

[2] 丹珠昂奔.民族工作方法论——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体会[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

[3]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M]//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

[4] 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84.

[5] 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442.

[6] 赵杰,田晓黎.语言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7]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5.

[8] 王力.汉语史稿(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2:506-507.

[9] 杨晓纯.西藏卡契、“藏回”辨析[J].青海民族研究,2017(4).

[10] 杨德亮.蒙回信仰春秋——托茂人伊斯兰信仰的历史与现状调查[J].青海社会科学,2009(2).

[11] 周传慧.“汉回”名称及群体出现的时间考[J].回族研究,2011(10).

[12] 格·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M]//历史研究编辑部.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228-254.

[13] 潘华,勾霄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民族政策之比较[J].社科纵横,2010(4).

[14]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0.

[15] 李红杰.由自决到自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267.

[16] 金寿铁.希望的视域与意义——恩斯特·布洛赫哲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责任编辑 马 旭)